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21年9月13日至10月1日
议程项目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2020年10月6日第45/20号决议提交，载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的调查结果。报告主要关注委内瑞拉的司法系统，介绍司法机构独立性、调查和起诉实际和想象的政府反对者以及侵犯人权行为及罪行长期不受处罚问题。调查团继续跟踪该国其他背景下发生的法外处决、强迫失踪、任意拘留以及酷刑和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并在任期延长阶段报告这些案件。

* 报告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以纳入最新信息。



一. 导言

A. 背景

1. 人权理事会在 2019 年 9 月 27 日第 42/25 号决议中设立了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调查团于 2020 年 9 月向安理会提交了第一份报告。¹ 理事会 2020 年 10 月 6 日通过第 45/20 号决议将调查团任期延长两年，至 2022 年 9 月。

2. 调查团任期延长可以使它继续调查 2014 年以来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法外处决、强迫失踪、任意拘留以及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如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人权理事会要求调查团向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书面调查报告。

3. 调查团通过本报告和详细调查结果文件，² 深入分析委内瑞拉司法系统相关人员在侵犯人权行为和罪行中的作用，以履行职责，打击有罪不罚，追究施害者全部责任和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本报告主要关注司法系统在调查和起诉实际和想象的政府反对者中的作用，以及任由侵犯人权和罪行长期不受处罚中的作用。

4. 在调查的案件中，这些实际和想象的政府反对者或批评者包括记录、谴责或试图解决该国人权或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个人和/或组织，以及干预或被认为干预政府人士的政治、经济或刑事利益的个人。

5. 尽管调查团继续调查其任务范围内的其他侵犯人权行为，但迟迟聘任不到工作人员妨碍调查团对当前重点领域以外的侵权行为进行深入调查和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报告。从第四十五届至第四十八届会议近一年时间里，调查团员额不到预期员额的三分之一。

6. 本报告关注这些重点绝不是忽视针对该国其他个人的法外处决、强迫失踪、任意拘留以及酷刑和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调查团仍将关注持续收到的指控，包括：

(a) 加拉加斯城内低收入社区治安行动中与以前记录的法外处决和其他侵权行为类似的杀戮。这些杀戮需要更深入调查，但有迹象表明仍在继续发生；

(b) 截至 2021 年 3 月在阿普雷州(Apure State)武装对峙中的杀戮和其他侵权行为，包括酷刑和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任意拘留，其中有国家警察和军队的参与；

(c) 奥里诺科矿业弧(Orinoco Mining Arc)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涉及军事和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实施的法外处决、强迫失踪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侵害土著人民和个人的行为；

(d) 在政府处置抗议包括经济及社会需求抗议中发生的杀戮、任意拘留、酷刑行为、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¹ A/HRC/45/33。另见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FFMV/A_HRC_45_CRP.11.pdf。

² 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8/Pages/ListReports.aspx>。

(e) 国家执法和情报部门继续实施酷刑和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与以前采取的模式相似，拘留条件相当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7. 调查团将在任期延长期间继续调查这些和其他情况，并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九届和第五十一届会议提供分析和结论。调查团将考虑国家和个人对 2020 年报告、本报告和未来报告所记录的侵权行为和罪行的责任以及受害者诉诸司法权利。

B. 方法和证据标准

8. 调查团遵循联合国制定的人权实况调查既定方法和最佳做法。调查团按照独立、公正、客观、透明和正直的原则开展工作。调查团采用的方法详见其 2020 年报告。³

9. 就本报告而言，调查团详细分析了 2014 年至 2021 年 8 月期间 183 起拘留想象或实际反对者(153 名男子和 30 名妇女)的案件，以评估逮捕、拘留和司法程序的时间、方式和情形。这些案件包含调查团 2020 年报告已审查和分析的几起案件。与此相关，调查团随时了解已进行的诉讼进展信息，并作出进一步分析。调查团还调查和分析了另外 73 起拘留案件，包括 2020 年 9 月以来发生的 19 起拘留案件。

10. 为调查需要，调查团查阅了数千页的法律案卷，包括检方逮捕令请求、法院的逮捕令和搜查令，以及初次出庭、初步聆讯、口头和公开审判、上诉和对其他法律行动的反应。

11. 调查团进行了 177 次访谈(男性 99 次，女性 76 次，男女混合小组 2 次)，包括 57 次采访受害者或其家属，60 次采访法律代表，36 次采访调查团任务所涉期间在司法机构任职的前法官和检察官。此外，调查团公布了一份调查问卷，向任何可证明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现任或前任法官、检察官和/或律师开放。它收到了 86 份答复，其内容反映在以下相关实质性部分(42 名男子、36 名妇女和 8 名身份不明者)。⁴

12. 人权理事会第 45/20 号决议敦促委内瑞拉当局与调查团充分合作，允许调查团立即、充分和不受阻碍地进入该国，并向它提供履行任务所需一切信息。调查团感到遗憾的是，执行任务两年来，政府仍然不允许调查团成员访问该国，也没有回复调查团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发出的 17 封信中的任何一封。

13. 调查团继续以“有合理理由相信”作为其证据标准。当收集到的事实材料能够让客观且通常谨慎的观察者满意，认为事件如所述那样已经发生，且具有合理的确定性，即符合该标准。调查团回顾，将由主管司法机构确定个人对所记录的侵权行为的责任，同时需要充分尊重被告的正当程序权利，包括辩护权。

³ A/HRC/45/33, 第 6-11 段。

⁴ 答复存入调查团档案。

二. 司法系统的独立性

14. 独立和公正的司法系统是维护法治和保护人权的必要条件。多年来，至少自1999年通过《宪法》以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进行的法律和行政改革削弱了司法系统的独立性。改革的更多信息可查阅调查团详细调查报告。根据一些前司法和检察机关的消息来源，近年来包括调查团任务所涉期间，检察和司法机构独立性受到破坏的速度在加快。

A. 法官的遴选和惩戒

15. 《宪法》确立了选择最高法院法官和下级法院法官的程序，包含了透明、非政治化和择优选择司法人员的保障措施。⁵ 逐渐不遵守这些标准是司法系统内外司法独立性恶化的根源。对最高法院法官遴选的政治干预造成其意识形态偏向发生永久性转变，对整个司法系统产生了连锁效应。

1. 最高法院法官

16. 《宪法》规定，最高法院法官将通过公开程序择优选出，任期12年。⁶ 过去几十年间，国民议会通过了各种规避这一宪法授权程序的法律，以增加对最高法院法官遴选的政治影响力。

17. 最高法院目前格局于2015年12月确定下来。在反对派赢得国民议会多数席位后，即将卸任的立法机构任命了32名最高法院法官，任期为2015年至2027年。⁷ 这些任命不符合相关的宪法规定，包括程序性时限。⁸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32名法官中，有29名是从执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密小圈子里挑选出来的。

18. 在2015年12月任命之前，13名离任法官提前退休。其中几个人后来作证说，最高法院院长麦克·莫雷诺(Maikel Moreno)向他们施加压力，⁹ 绕过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免职的法律要求。¹⁰ 国家其他机关多次试图取消2015年12月的任命，但都被最高法院驳回，实际上是让新法官自己确认自己的任命。

19. 由于最高法院对司法系统内其他机构行使几乎完全的控制权，包括任命和惩戒初审和上诉法官以及任命刑事司法巡回法院院长，这些任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最高法院还对所有法律和其他法律条款进行宪法审查。¹¹

⁵ 第255、263和264条。另见《最高法院组织法》第37条。

⁶ 第264条。

⁷ 国民议会发布的协议，*Gaceta Oficial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No. 40.816 (2015年12月23日)。

⁸ 《最高法院组织法》第70-71条。

⁹ 国民议会研究和分析最高法院院长和候补法官遴选程序特别委员会的最后报告，2016年，第11-12页。

¹⁰ 调查团于2021年7月30日和9月3日就此致函莫雷诺先生。在撰写本报告时，尚未收到答复。

¹¹ 《宪法》第334条。

2. 一审和上诉法官

20. 最高法院负责法官的任命和宣誓就职。¹² 根据法律，法官的录用和晋升必须按照候选人专业精神和适合性的原则，通过公开竞争程序来决定。¹³ 自 2003 年以来，没有举行过法官的竞争性选拔考试，而是由最高法院临时任命法官，这意味着最高法院可以在不遵守宪法程序情况下选拔和罢免法官。2021 年 1 月司法年度开始时，最高法院院长莫雷诺报告说，2020 年任命了 881 名临时法官。¹⁴

21. 最高法院通过其司法委员会任命临时法官。司法委员会最初任务主要是行政职能，但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决议逐渐授予它更广泛权力，负责选择和惩戒初审和上诉法官。根据所接触的消息来源，司法委员会主要根据个人或政治考虑进行提名和罢免。

3. 法官的惩戒和免职

22. 尽管宪法保证对法官的纪律处分程序是公开的、口头的、快速的和符合正当程序的，但接受采访的法官报告说，他们经常受到解雇威胁或要求辞职或提前退休的压力。法官们称，刑事司法巡回法院院长应对许多此类威胁负责，这些威胁是出于报复或胁迫目的。

23. 《宪法》(第 267 条)规定，对法官的惩戒应符合司法道德守则；10 年后的 2009 年，国民议会通过了这样一部守则。2013 年，最高法院发布了一项判决，认为司法道德守则不适用于临时法官，尽管该守则有与之相悖的明确规定。如一位司法人士所说的，由此产生了两类法官：“有权利的和没有权利的”。

24. 法院督察局负责接收和核实对法官履职的投诉。¹⁵ 虽然督察局打算自主运作，但知情人士透露，最高法院全体庭逐步加强了对督察局的控制。自 2004 年以来，除一名督察长外，所有督察长都同时在最高法院任职，损害了督察长的独立性。

25. 前法院督察们告诉调查团，最高法院法官经常干预具体案件，直接或通过督察长要求启动对某些法官的调查。由于一些司法人员被认为“不可触犯”，法院督察员工作受到进一步阻碍。即使有理由相信他们确有违纪行为，督察员也必须找到办法来证明罢免他们的合理性。

B. 检察官的遴选、惩戒和免职

26. 《宪法》第 286 条规定，将制定适当措施，确保检察官的适合性、廉洁性和职业稳定性。《检察署组织法》规定了检察官的职业生涯(第 93 条)，可通过公开竞争和竞争性考试获得(第 94 条)。

¹² 同上，第 255 条。

¹³ 同上。

¹⁴ Maikel Moreno, Nicolás Maduro y M. Ameliach, “Inicio del año judicial 2021 en Venezuela”, 22 January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mtCRsQcpY> (minute 26:30).

¹⁵ 最高法院全体庭关于法院督察局职能管理的第 216-0022 号决议，第 2 条。

27. 根据所收到的信息，在撰写本报告时，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几乎所有检察官都是临时的。¹⁶ 2018 年 9 月，新任总检察长塔里克·威廉·萨博(Tarek William Saab)主持通过了第 2703 号决议，实际上废除了检察官职业生涯。他在该决议中宣布，检察署内的所有公务人员都任职于“受信任岗位”，可能随时被任命和免职。据约谈的前检察官称，进入检察署工作不再遵从择优标准，而是主要取决于个人政见或政治因素或影响。

28. 调查团收到一致信息表明，惩戒程序无法保障检察官按照依法确定的此种程序获得客观评价和决定的权利。各级检察官都受到影响，冲击最大的是起诉过公共政治或安全官员和调查过政治抗议中违法行为的检察官。2015 年《检察署章程》列出了对检察官的惩戒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不适用于非职业检察官。¹⁷

29. 最高法院全体庭在 2017 年 6 月 20 日的第 43 号判决中，剥夺了总检察长路易莎·奥尔特加·迪亚斯(Luisa Ortega Díaz)的豁免权，理由是她未能调查“反对派政党引发的暴力行为”造成的死亡，存在“严重渎职”。¹⁸ 后来，全国制宪会议在第一批的一项法案中解除了她的职务，¹⁹ 尽管法律规定这一决定须由国民议会作出。

30. 调查团收到了前检察官(包括终身和临时检察官)的可靠信息，他们称自己是出于政治动机不经任何程序遭免职的。2017 年 8 月总检察长更换后，立即裁撤了全国 196 名检察官，其中许多人曾公开批评政府行动，包括全国制宪会议的选举。²⁰

C. 干涉司法和检察机关独立性

31. 各级司法和检察人员告诉调查团，他们经历或目睹了外部干预和(或)收到了如何裁定某些不符合事实案件的指示。这些指示既来自政府官员，也来自上级司法或检察机关人员，他们往往协调行动。

32. 调查团从各司法机构多处来源收到信息称，某些人是不可触犯的，是不能对他们进行起诉的。这些人包括能够控制和影响法官及检察官的人员，如政治和安全官员，有些人与经济和/或犯罪利益有各种联系。

1. 干涉最高法院事务

33. 知情人士透露，最高法院法官通常会收到如何判决的指令。至少从 2015 年到 2018 年，行政部门以三种方式向最高法院传达指令：直接向相关法官传话，有时邀请法官前往米拉弗洛雷斯大楼(Miraflores)(总统府)；由指定中间人在行政部门与最高法院之间传递信息；和/或马杜罗(Maduro)总统或迪奥斯达多·卡韦略(Diosdado Cabello)议长公开讲话后，常常编写成会议纪要在法官中传阅。

¹⁶ 另见 *Acceso a la Justicia, Informe sobre el Desempeño del Ministerio Público (2000–2018)*，第 35 页。

¹⁷ 《检察署章程》，第 87 条。

¹⁸ 调查团注意到收到了奥尔特加·迪亚斯女士担任总检察长期间有人干涉检察独立的指控。

¹⁹ 见 *Gaceta Oficial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No. 6.322 (2017 年 8 月 5 日)。

²⁰ 检察官名单存入调查团档案。

34. 2015 年 12 月任命的最高法院选举法庭一名前法官说，交给他的首批判决之一是一份取消亚马逊州当选代表资格的判决书草案，判决将排除反对派在国民议会中的合格多数。据称，当时即将离任的国民议会议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 (Diosdado Cabello) 指示他根据选举法庭庭长的指示来决定此案。然后，选举法庭庭长告诉这位大法官，该国面临内战危险，他必须签署判决书，否则他将对后果负责。

35. 除了收到政府官员的指示外，法官还受到最高法院内部的压力。法官们被召集到全体庭开会，会上向他们出示事先准备好的判决书，要他们签字。用一位最高法院前法官的话来说，“没有时间阅读判决，也没有时间思考”。一位最高法院前律师对此表示赞同，称判决是预先起草的，打印出来供法官签名：“我们都看到了，在那里工作的每个人都看到了”。

2. 干涉巡回刑事法院事务

36. 前法官(得到书记员证实)们一致报告说，他们收到指示或受到其他压力，必须以某种方式判决政治案件。指令通常来自司法机关内部，经由刑事司法巡回法院院长传达。刑事司法巡回法院院长收到的指示可能来自最高法院刑事上诉法庭和/或院长。据一名前法官称，高级别政治官员有时会直接打电话给法官，或者通过电视讲话发出含蓄指示。

37. 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证实了上述情况。他们告诉调查团，他们目睹过法官被指示如何裁决案件。一名辩护律师讲述了看到法官在宣布一项决定之前离开法庭，以便接受上级指示。若干此类实例收录于调查团详细调查报告。

38. 调查团一再被告知，在政治案件中，案件分配程序受到了操纵。管辖区内的刑事司法巡回法院院长将案件人工分给某些遵循指示的法官。以前，案件通过计算机软件程序在诉讼法庭内分配，以确保公平和随机。

39. 调查团审查的案件反映了这种选择性分配方式。在它调查的拘留案件中，23%是在四个专门的反恐巡回法庭之一审理的。令人关切的是，这些反恐法庭不是按照《宪法》第 261 条的要求依法设立的，而是由最高法院通过第 2012-0026 号决议设立的。²¹

40. 国家还利用军事法庭审理平民的政治案件。²² 调查的案件显示，这种做法在 2017 年行政部门与奥尔特加·迪亚斯女士发生冲突期间最为普遍。在调查团分析的军事法庭审理的 85 起涉及军人和平民的拘留案件中，绝大多数分配给同两名军事法官审理。

²¹ 见 *Gaceta Oficial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No. 40.092 (2013 年 1 月 17 日)。

²² 见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FFMV/A_HRC_45_CRP.11.pdf, 第 364-367 段。

3. 干涉检察机关独立性

41. 各级检察官都报告说，他们有时收到如何处理案件的指示。这类干预经常出现在调查与政治、经济和/或犯罪利益有联系的人士的案件中，以及处置政治抗议时拘留的案件中。奥尔特加·迪亚斯女士告诉调查团，从 2015 年起，她“每天，在每一件事”上都与行政部门抗争。她分享了所受到压力的一些例子，大多数涉及政治反对派知名成员或同伙的案件。

42. 许多检察官对调查团说，他们收到检察机关内部对处理不符合事实案件的指示，特别是上级检察官或部门主管的指示。一些检察官表示，在 2017 年总检察长更换后，此类指示大幅增加。

43. 调查高知名度腐败案件的检察官面临着特殊压力。前检察官们说，一些此类案件在检察署搁置多年，没有进展。调查在 2016 年底和 2017 年初开始加速，据称揭露了许多高级政治官员参与大规模非法计划的情况。2017 年 1 月初，参与这些调查的检察官开始承受更大压力。

44. 据几位接受采访的检察官称，当奥尔特加·迪亚斯女士以总检察长身份公开抨击政府时，特别是在 2016 年和 2017 年，检察署作为一个机构开始受到攻击。前检察官们告诉调查团，在此期间，不再允许检察官进入拘留场所视察拘留条件，法官也拒绝签发逮捕令或搜查令。

45. 几位内部人士报告说，在萨博于 2017 年 8 月 5 日就任总检察长后的几天里，10 至 15 名戴头套的武装人员被允许进入检察署。他们拍照，设置警戒线，进入办公室，拿走文件。调查团获悉，萨博先生上任后，迅速解散了检察署内的各个专门单位，削弱了其独立调查国家机构成员所犯罪行的能力。

D. 对法官和检察官的其他形式压力

46. 法官和检察官还受到其他压力，包括骚扰和惩罚，干扰他们正当开展专业活动。与正式诉讼后的处罚不同，这些隐性制裁不是法律或监管程序规定的，但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或人身安全和/或开展工作的能力。

47. 接受采访的前法官和检察官报告说，他们及其家人受到威胁和恐吓，包括电话窃听、监视和跟踪。近一半受访的前法官和检察官出于安全考虑离开了该国。一些受访者报告说，他们因实际或想象的政治倾向而受到社群或其他非国家武装团体成员的威胁或骚扰。

48. 前法官和检察官告诉调查团，他们开展工作时就担心会在纠缠和虚假诉讼中受到刑事起诉。几位受访法官和律师表示，2009 年法官 María Lourdes Afiuni 被捕后受到刑事起诉，可以明显看到司法独立性下降。前检察官 Luis Sánchez Rangel 被拘留是一恰当例子。在撰写本报告时，他未经审判已被关押在 El Helicoide 大楼(玻利瓦尔国家情报局(SEBIN))的民事情报局四年，刑事诉讼程序出现许多违规。

49. 许多受访者表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法律从业人员的低工资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压力，给法官和检察官筑起某种堡垒，迫使一些人离职，并令其他人寻找容易非法赚钱的机会。许多受访者包括内部人士都证实，某些法官和检察官被指控为了交易，包括为案件的法律利益，推进案件搁置，将案件归档或接收法院判决的副本。

E. 外部行为者参与刑事诉讼

50. 刑事起诉包括控告个人犯罪，并要求国家行使惩罚权。²³《宪法》、²⁴ 2012 年《刑事诉讼法》²⁵ 和 1998 年《军事司法组织法》²⁶ 明确规定了检察署或军事检察院的权限，²⁷ 即酌情命令和指导刑事调查和起诉。调查团的调查揭示了另外一种情况，即外部行为者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有时对其施加不当影响。部分原因是检察机关未能保持充分控制权。

51. 高级别政治人士发表公开讲话，对所审查的 183 起拘留实际或想象反对者的刑事案件中的 102 起进行评论。在发表此类评论时，高级别政治人士传递的信息是，他们有特许渠道了解刑事调查，或者检察和司法机构代表他们行事。这些人士的公开讲话通常表达了对被告的有罪或无罪、性格或名誉的定论，可能损害被告的权利。²⁸

52.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讲话披露了与调查有关的敏感或机密信息，包括只能来自检察、执法或情报官员的证据。²⁹ 有些评论公开了高级官员所称的被调查者的供认或供词，包括没有律师在场、胁迫或酷刑或被单独监禁情况下的供述。在其他讲话中，政府高级官员出示与案件有关的物证，可能损害证据或干扰监管程序。

53. 《刑事诉讼法》第 514 条明确规定，拥有刑事调查权力的机构都应直接支持检察署行使其职能，并遵循其指示。

54. 在实际或想象的政府反对者的案件中，民事情报机构和军事情报机构(军事反情报总局(DGCIM))对指导调查发挥了重要作用。³⁰ 一名前检察官告诉调查团，有时情报机构全权进行调查，检察官批准他们的行动和决定。在调查团审查的案件中，情报机构都进行过监视、证据收集、编写专家报告、法医分析、逮捕、审讯和拘留，并在法庭上提供证词。

55. 在法院下令释放被拘留者后，或者在被拘留者服刑期满后，情报机关仍不释放他们，表明它们希望在司法控制之外行动。情报机构不加指控长期拘留个人，例如拘留 Leonard Hinojosa 的案件。他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被关押在苏利亚(Zulia)州，然后被军事情报局转移到加拉加斯的 La Boleíta 拘留所，直到 2021 年 3 月 12 日，没有被带见法官或被告知拘留原因。

²³ Magaly Vásquez González, *Derecho Procesal Penal Venezolano* (Universidad Católica Andrés Bello, Caracas, 2019), p. 52.

²⁴ 第 285 条第(3)款。

²⁵ 第 11 和 111 条。

²⁶ 第 70 条。另见 2020 年玻利瓦尔国家武装部队宪法法律，第 188 条。

²⁷ 调查团将这两个机构统称为检察机关。

²⁸ 这些权利载于《宪法》第 49 条第(2)款和《刑事诉讼法》第 8 条。

²⁹ 诉讼程序的保密性载于《刑事诉讼法》第 286 条。

³⁰ 参见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FFMV/A_HRC_45_CRP.11.pdf, 第 267 页。

56. 2021年5月12日，马杜罗总统颁布了第4.610号法令，命令在30天内将民事或军事情报机构拘留人员转移到监狱管理部拘留中心。³¹ 据非政府组织刑事论坛称，在撰写本报告时，有18人在该法令2021年5月12日生效后被转移，有16人在该法令生效前一周被转移。19名政治犯仍关押在军事情报局拘留设施。³² 2021年5月12日之后，没有记录到从民事情报机构拘留设施向外转移人员的情况。即使该法令颁布后，这些设施中仍关押着实际和想象的政治反对派，例如 Javier Tarazona 和另外两人在2021年7月2日被捕后关押在 El Helicoide 情报大楼。

三. 法官和检察官的作为和不作为

57. 《宪法》³³ 和《刑事诉讼法》³⁴ 载有一系列在刑事诉讼中必须遵守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无罪推定、辩护权、程序保障和给予受害人赔偿义务。

58. 调查团的调查显示，刑事诉讼程序充斥着检察和司法人员在诉讼各个阶段相当于任意拘留的违规行为。³⁵ 司法和检察人员也未能防止或充分处理其他国家行为者对实际或想象反对者的侵害和犯罪，尽管检察官、³⁶ 诉讼法院法官³⁷ 和审判法官³⁸ 有法律义务这样做。这些失职直接助长了侵犯人权行为和罪行不受处罚，并阻碍遭受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侵害个人获得有效法律救助和司法补救。

A. 未能确保拘留的合法性和对侵权行为采取行动

59. 根据《刑事诉讼法》，诉讼法院法官负责确保遵守《宪法》、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签署和批准的国际条约、公约或协定以及《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原则和保障。

1. 犯罪当场逮捕

60. 《宪法》规定，除非法院下令，或犯罪当场抓获，否则不得逮捕或拘留任何人。³⁹ 调查团对案件的调查显示，非法拘留经常发生。令人关切的是2001年最高法院宪法法庭第526号判决，其中指出，无论是诉讼法院还是上诉法院都不需要审查警察不出示逮捕证实施逮捕的合宪性。

³¹ *Gaceta Oficial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12 May 2021; extended for 30 days through Presidential Decree No. 4.528, *Gaceta Oficial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No. 42.147 (11 June 2021).

³² 从刑事论坛收到的材料，2021年8月27日。

³³ 第30和49条。

³⁴ 第1-23条。

³⁵ 另见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FFMV/A_HRC_45_CRP.11.pdf, 第348段。

³⁶ 《宪法》第285条第(1)款。

³⁷ 《刑事诉讼法》第264条。

³⁸ 同上，第324、328和345条。

³⁹ 第44条。

61. 调查团在 2020 年报告中认定存在一种情形，即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成员利用犯罪当场逮捕的可能性，对实际和想象反对者进行任意逮捕，尽管没有刚刚或正在发生犯罪。在记录的一些案件中，给出的逮捕理由与逮捕几天后被拘留者初次出庭时在法官面前受到的指控形成鲜明对比。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提出新的指控，令人怀疑检方是否有能力开展充分调查，以支持根据新指控提出的审前拘留请求。

2. 逮捕和审前拘留的依据

62. 诉讼法院法官只能应检方请求，在特殊情况下，⁴⁰ 或当其他预防措施不足时，⁴¹ 下令审前剥夺或限制自由。尽管如此，在涉及实际或想象反对者的案件中，这种拘留令经常下达，司空见惯。在调查团记录的已初次出庭的 170 起案件中，有 146 起案件决定对被告实行审前拘留。

63. 调查团对初次出庭记录的审查发现，诉讼法院法官往往不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提出理由说明他们如何作出存在逃离或妨碍调查风险充分证据的决定。⁴²

64. 所审查的案件还揭示了诉讼法院法官拒绝重新考虑或取消审前拘留措施的情况，即使法律规定的两年限期已经过去，亦未申请对该限期的任一法律例外。⁴³ 在撰写本报告时，调查团审查的 170 起初次出庭案件中，有 80 起案件(47%)决定预防拘留两年以上。

3. 非拘禁防范措施

65. 即使没有下令实施审前拘留，也经常对被告采取过度限制或过长的防范措施。《刑事诉讼法》旨在限制将预防性剥夺自由当作防范措施，为此规定了可以采取的八种替代性措施。⁴⁴ 防范措施的采用必须与所控罪行的刑罚相称。⁴⁵

66. 在调查团审查的一些案件中，防范措施的实施时间相当于所涉罪行的刑期。此外，替代性防范措施似乎常常限制言论或集会自由权或其他宪法权利，对于确保被告出庭或不干扰调查是没必要的。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期间法院休庭，造成诉讼进一步延误，延长了防范措施的期限。⁴⁶

4. 逮捕令和逮捕报告中的偏差

67. 调查团记录了签发逮捕令，包括情报或执法机构出具的逮捕文件与检方准备的控告材料之间的差异。检察和司法人员要么直接参与，制造了这些偏差，如倒签逮捕令，要么间接参与，在法律卷宗中经常塞入不准确或欺骗性逮捕记录。

⁴⁰ 《刑事诉讼法》第 229 条。

⁴¹ 同上，第 67 和 229 条。

⁴² 同上，第 236 条。

⁴³ 同上，第 230 条。

⁴⁴ 同上，第 242 条。

⁴⁵ 同上，第 9 条。

⁴⁶ 最高法院 2020 年第 1 号决议。该决议随后续延六次，超过七个月。

68. 调查团对案卷文件的审查显示，修改日期似乎为了掩盖逮捕时未能获得逮捕令或未能在法定时限内将被拘留者带见法官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官方的逮捕日期可能用于掩盖受害者声称遭受短期强迫失踪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们被单独监禁，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包括性暴力。

69. 调查团记录了 19 起军人任意逮捕和短期强迫失踪事件，检察官和法官通过事后签发逮捕令来维持这些事件。修改后的日期制造了维护被拘留者权利的记录，可与被拘留者叙述的事件版本不一样。

5. 未能对逮捕和拘留期间的其他非法行为包括短期强迫失踪采取行动

70. 与其他国家行为者一样，警方调查机构侵犯《宪法》保障的个人权利的行为时，这些行为无法律效力。下令或实施这些行为的公务人员将承担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无论他们是否根据上级命令行事。⁴⁷ 尽管诉讼法院法官在这方面负有法律责任，⁴⁸ 调查团的调查发现，他们接到警察或情报机构在拘留中实施违规或非法行为的投诉时，没有采取有效行动。

71. 在调查的一些案件中，被告在诉讼法院提出了这类违规行为，但没有得到回应。这包括 Franklin Caldera 的案件。他在初次出庭时，向第四反恐诉讼法院控告，他于 2021 年 2 月 11 日被军事情报局人员从哥伦比亚押回，随后受到审讯和酷刑约 12 天，在此期间，他的下落未经官方证实。

72. 调查团以前记录的执法或情报机构在逮捕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也反映在本报告审查的案件中。这些行为包括逮捕当局不出示逮捕令或不解释指控理由；逮捕时不表明身份，包括遮盖面部或使用化名；运送被拘留者时，蒙上他们的头或眼睛，或迂回行驶；以及逮捕时过度使用武力或暴力。

73. 在某些情况下，据称安全或情报人员使用犯罪手段，包括绑架或拘留家属，来诱捕实际或想象的反对者。被控参与 2020 年 5 月的格代翁行动(Operation Gedeón) 的一名被告在预审时告诉诉讼法院，军事情报机构人员对他实施了酷刑，并告诉他将采用 *Sippenhaft* 方式(纳粹使用的集体惩罚策略)，随后逮捕了他的两个姐姐和姐夫，并将他们关在 La Boleíta 拘留所 32 天。

74. 被告们一再声言遭到单独监禁，特别是在拘留的头几天，并与家人或律师失去联系。根据《刑事诉讼法》，被告有权与其亲属或律师联系，告知他们被拘留的情况。⁴⁹ 时常在秘密或非官方拘留设施单独拘押，特别是在拘留的头几小时或头几天。⁵⁰ 在几起案件中，被拘留者向法院当局提出了单独拘押问题，但没有得到回应。

⁴⁷ 《宪法》第 25 条。

⁴⁸ 《刑事诉讼法》第 264 条。

⁴⁹ 同上，第 127 条。

⁵⁰ 另见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FFMV/A_HRC_45_CRP.11.pdf, 第 315 段。

75. 一些实际或想象的反对者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人遭到短期强迫失踪。⁵¹ 违反宪法保障剥夺或限制自由后，个人有权申请人身保护令。⁵² 这些案件表明，法院即使知悉任意拘留情况，并知道已申请人身保护令，也没有系统审查和处理非正常逮捕和拘留，包括短期强迫失踪案件。

6. 未能调查酷刑和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包括性暴力的指控

76. 在调查团审查的 183 起案件中，有 113 起案件的被拘留者或其代表控告他们遭受酷刑、性暴力和/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家属和法律代表也通过书面材料向诉讼法院、检察署和/或监察专员办公室提出此类指控。在 183 起案件中的 67 起案件中，有的被拘留者带着受虐待伤痕出庭，有的提出受虐待的指控。

77. 有些法院记录不列入法官对这些指控的答复。另一些记录则显示，诉讼法院法官对酷刑指控的回应是命令检察署核实指控或进行体检。同一些法庭记录还显示，即便如此，法官还下令对被告继续进行审前拘留，由被指控的酷刑实施者即军事情报局和民事情报局看管。

78. 审理酷刑指控法官的作为和不作为对受害者产生了严重后果，包括继续遭受酷刑和健康恶化。一名被拘留者直接对诉讼法院法官说，法官决定将他送回军事情报局拘留所后，他遭受了约三个月的连续酷刑，包括中午、早 6 时和凌晨 3 时的毒打。另一名被拘留者初次出庭时，尽管诉讼法院法官收到酷刑指控，但仍将她送回军事情报局拘留所，使她遭受酷刑并流产。即使法官要求调查酷刑指控，调查团联系的受害者代表也不知道采取了哪些有效调查步骤。

79. 几名受害者、证人和辩护律师告诉调查团，有些被告不向司法当局举报酷刑，要么是出于恐惧，要么是对司法回应缺乏信任。初次出庭时尤其如此，因为刚刚经历过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包括性暴力。

B. 支持指控

1. 逮捕和拘留基于不充分证据

80. 在调查的案件中，被告被指控犯有可能遭受重判的严重罪行。调查团对案卷的审查发现，诉讼法院有时根据事实和证明文件拘留和指控个人，而这些事实和证明文件没有提及犯罪行为，也没有认定被告个人参与所控犯罪。诉讼长时间延误，继而丧失了初次出庭或合理时间内的审判中质疑这些证据的机会，被告只得在审前拘留中度过更长时间或被施加长达数年的替代性防范措施。

2. 来自非法审讯的证据

81. 《刑事诉讼法》只允许接受通过合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不得接受通过酷刑、虐待、胁迫、威胁、欺骗、不当侵犯隐私(家庭、通信、通信或私人档案)获得的信息，或通过任何其他方式获得的损害个人意愿或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信息(第 181 条)。

⁵¹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以前时期也发生过此类失踪。同上，第 278 和 313 段。

⁵² 《保护宪法权利和保障的组织法》，第 39 条。

82. 调查团发现了一些通过胁迫或无律师在场的审讯中获得供词、有罪陈述或其他信息，包括电话和社交媒体密码的情况。《宪法》规定，有效的供词必须没有任何胁迫，⁵³ 获得时必须要有律师在场。⁵⁴ 调查团还记录了司法机关未履行职责，防止根据第三方非法提供的信息进行逮捕的案件。

83. 在记录的 183 起拘留案件中，有 82 起案件的被拘留者尽管受到酷刑，但继续被检察和司法当局控告犯罪。调查团对法律案卷的审查发现，即使得知非法审讯后，检察和司法机关仍继续允许军事和民事情报机构进行刑事调查，并继续依赖这些情报机构获得的证据，包括以不当手段取得的证据。一些相关实例载于详细报告中。

3. 来自非法搜查的证据

84. 尽管法律规定搜查住宅、企业或公共办公室必须事先获得诉讼法院的授权，⁵⁵ 并需要满足其他条件，⁵⁶ 但调查团的调查发现，一些案件没有遵守这些要求。在记录的 73 起案件中，警察没有搜查令而搜查了被拘留者的家和/或办公室，并扣押了物品，包括 2021 年 1 月 12 日搜查 Azul Positivo 组织。在调查的另一些案件中，没有搜查令而从计算机或电话中获取证据，有时胁迫或强迫主人交出密码。

4. 栽赃、伪造或操纵的证据

85. 调查团发现了一种情形，即检察或司法机关依赖伪造、操纵或栽赃的证据来证明逮捕的正当性或支持指控，和(或)未能调查根据此类证据实施拘留的指控。调查团查明并记录了 24 起涉嫌利用伪造、操纵或栽赃的证据进行拘留的案件。此外，答复调查团问卷者(都是辩护律师、前检察官或前法官)有 78.82% 表示，他们在支持指控的案件中观察到此类篡改证据情况。

C. 辩护权

86. 调查团发现，干扰辩护权是最常提到的侵权行为之一。根据《宪法》，获得法律援助和辩护的权利不可侵犯。⁵⁷ 被告有权在调查的最初阶段即得到由其本人或其亲属指定的辩护律师的协助，如果没有，则得到公设辩护人的协助。⁵⁸ 在审查的 170 起指控被告犯罪的案件中，有 54 起案件(32%)的被告在初次出庭或随后的调查阶段被法官剥夺了选择律师的权利。

⁵³ 第 49 条第(5)款。

⁵⁴ 《刑事诉讼法》第 132 条。

⁵⁵ 同上，第 196 条。

⁵⁶ 同上，第 197 条。

⁵⁷ 第 49 条第(1)款。

⁵⁸ 《刑事诉讼法》第 127 和 139 条。

87. 辩护律师报告说，他们无法进入某些拘留设施，特别是民事和军事情报机构管理的拘留设施，也不能与当事人联系签署委托书。即使签署了委托书，也一再推迟私人辩护律师在法官面前宣誓就职的时间。辩护律师还抱怨说，法院官员经常阻止他们进入法庭为当事人辩护，特别是初次出庭的辩护。

88. 调查团还发现了一些初次出庭在拘留场所进行的情况，进一步阻碍了与私人辩护律师接触的机会，如被控参与“格代翁行动”的 Josnars Baduel 和其他被告的案件，他们的初次出庭和初步聆讯都是在 El Helicoide 情报大楼进行的。

89. 即使被告能够获得自己选择的代理人，律师准备充分辩护的能力也受到各种限制。与调查团交谈的辩护律师表示，面对对案件往往是武断的一再干扰，他们感到沮丧、疲惫和挫败。根据《刑事诉讼法》，被告有权知悉调查档案中的内容。⁵⁹ 在调查团审查的进入诉讼程序的 170 起拘留案件中，有 92 起案件的检察官或法官没有向辩护律师提供重要的案卷信息，包括警方记录、起诉书或审讯记录。

90. 影响辩护权的另一因素是安全部队对辩护律师和/或其家人的骚扰和恐吓。在对调查团问卷作出答复的 56 名辩护律师中，有 57% 的人说，他们自己或家人受到了某种形式的威胁或骚扰，包括来自军事、警察或情报官员的威胁或骚扰。骚扰包括监视、紧追其车辆、接到恐吓电话或不许进入法庭。

D. 不应有的延误

91. 根据《刑事诉讼法》，法官不得无故不做决定，必须确保毫不延误地发布判决。⁶⁰ 调查或审查的案件显示，系统地违反《刑事诉讼法》为各种诉讼步骤规定的时限。许多案件超出了诉讼时限。2020 年，由于 COVID-19 疫情，法院被责令休庭 7 个月，从而加剧了诉讼延误。

92. 调查团评估了 183 起拘留案件中 144 起案件的诉讼时限，⁶¹ 发现法律允许的时限与实际做法差异很大。77% 案件的初次出庭时间在法律允许的 48 小时期限之后，18% 的被拘留者在初次出庭之前已被关押一周以上。在此期间，被拘留者往往被单独拘禁，拘留不受监督，容易遭受酷刑、性暴力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93. 最出格的拖延发生在初次出庭与初步聆讯之间。从逮捕到初步聆讯的平均时间为 243 天(约 8 个月)。⁶² 调查团记录的 102 起拘留案件的初步聆讯被推迟不止一次，通常是多次。调查团记录的 16 起拘留案件的初步聆讯推迟了两年多，在此期间，被拘留者要么遭审前拘留，要么被采取替代性防范措施。

⁵⁹ 同上，第 127 条。

⁶⁰ 同上，第 6 条。

⁶¹ 如果被拘留者从未出庭面见法官，或者无法确定相关的逮捕或审讯日期，则将案件排除在外。

⁶² 所记录的从逮捕到初步聆讯的最短时间为 82 天，而最长时间为 1,308 天(约三年半)。

94. 所调查的案件还显示，在确定审判日期、处理上诉和回应辩方请求方面存在延误。一些案件的刑事诉讼似乎取得了进展，但被告仍被审前拘留，实际状况没有发生变化。调查团审查了 55 起诉讼已进入审判阶段的拘留案件，注意到从初步聆讯到开始判决平均有 523 天(超过 17 个月)。在撰写本报告时，只有 19 起案件的诉讼最后作出判决，逮捕后到判决平均时长为 759 天(两年多)。

四. 司法系统对侵犯人权指控的回应

95. 国家负有宪法义务调查并酌情惩处公务人员涉嫌侵犯人权行为犯罪。⁶³ 根据《宪法》，危害人类罪、严重侵犯人权罪和战争罪被排除在赦免和大赦之外，不受任何时效法规的限制。⁶⁴

96. 本报告主要关注司法系统对实际和想象的政府反对者案件的处理，但问责方面的数据和分析范围更广，涉及其他背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分析的重点是司法系统采取哪些行动调查和起诉 2020 年报告中列出的具体罪行，包括法外处决、强迫失踪、任意拘留以及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97. 根据《宪法》，所有公民都有权获知与他们直接相关的诉讼状况。⁶⁵ 检察署应依法公开透明地履行职责。⁶⁶ 总检察长必须向国民议会提交公开年度报告，介绍检察署工作，包括调查和惩治侵犯人权行为的努力。⁶⁷

98. 在前任总检察长迪亚斯女士的领导下，检察署根据宪法规定，于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向国民议会提交了书面报告。2017 年，萨博先生接任总检察长后，检察署停止发布公开的书面年度报告，仅口头介绍最新情况，包括通过采访、新闻发布会和社交媒体有选择披露检察署工作信息。

99. 调查团根据总检察长 2014 年以来提供的信息和检察署 2020 年发布的公开报告(其中部分回答了调查团 2020 年报告中的一些问题)⁶⁸ 中的信息编制了以下图表。该国只是分列了被指控、起诉、逮捕和定罪的官员人数，并说明了信息来源和所涉时期。然而，没有按照年份、犯罪者性别或年龄、控罪、刑罚类型和刑期以及被调查、指控、起诉或定罪的官员级别分列数据。

⁶³ 《宪法》第 29 条。

⁶⁴ 同上，第 29 和 271 条。

⁶⁵ 同上，第 51 和 143 条。

⁶⁶ 《检察署组织法》第 11 条。

⁶⁷ 《宪法》第 276 条。

⁶⁸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La verdad de Venezuela contra la infamia Datos y testimonios de un país bajo asedio*, 28 September 2020.

检察署报告的侵犯人权犯罪的调查和起诉情况

信息来源和所涉时期	控告官员人数	起诉官员人数	逮捕官员人数	判罪官员人数
总检察长年度报告(2014年) (2014年1月至12月)	30
总检察长年度报告(2015年) (2015年1月至12月)	1 312	959
总检察长年度报告(2016年) (2016年1月至12月)	2 441	635	225	226
对全国制宪会议的致辞 (2018年2月) (2017年8月—2018年2月)	..	28
总检察长新闻发布会 (2019年8月9日) (2017年8月—2019年8月)	406	695	353	109
总检察长新闻发布会 (2019年11月27日) (2017年8月—2019年11月)	505	766	390	127
总检察长新闻发布会 (2020年8月20日) (2017年8月—2020年8月)	584	925	450	140
国家发表的公开报告(2020年) (2017年8月—2020年8月)	603 (+35名平民)	811 (+129名平民)	452 (+29名平民)	127 (+13名平民)
总检察长对国民议会的致辞 (2021年2月25日) (2017年8月—2020年12月)	677 (+39名平民)	1 119	519	171 (+13名平民)
总检察长新闻发布会 (2021年5月1日) (2017年8月—2021年5月)	716	1 064	540	153

100. 调查团注意到所提供的数字有一些偏差，特别是2020年8月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数字与2020年国家报告中提供的数字有偏差，据称这些数字是涵盖同一时期(2017年8月至2020年8月)；以及总检察长2021年2月对国民议会讲话中提到的数字与他2021年5月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数字之间有偏差。

101. 监察专员办公室的任务是协助追究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⁶⁹ 它还有义务编写年度工作报告。⁷⁰ 在撰写本报告时，该办公室已发表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20年的年度报告，但尚未公布2018年和2019年的年度报告。通过这些报告可以详细了解它的工作。然而，监察专员办公室收到了大量投诉，而它处理这些投诉的活动表明没有充分履行其宪法职责，推进、捍卫和监督《宪法》和人权条约规定的权利和保障。

⁶⁹ 《宪法》第280-281条。

⁷⁰ 同上，第276条；2004年《监察员办公室组织法》第29-30条；2001年《公民部门组织法》第65条。

102. 总检察长在 2021 年 5 月 1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收到了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初步审查的有关问题，并报告说在所谓的标志性案件中取得了进展。初步审查涉及至少 2017 年 4 月以来拘留的实际或想象的政府反对者的待遇。⁷¹ 总检察长特别提到调查团审查的虐待以下三个人的案件：Fernando Alberto Albán、Rafael Acosta Arévalo 和 Juan Pablo Pernaleté 的案件。调查团注意到，在所有三起案件中，调查范围仅限于不太严重的罪行和(或)只有最低级别官员受到刑事起诉。

103. 调查团审查了 2020 年详细调查报告中列入的所有 19 起镇压实际或想象政府反对派案件的国内调查和诉讼状况。除了 Albán 先生、Acosta Arévalo 先生和另一个人的案件之外，调查团掌握的资料显示没有采取实际、具体和积极调查步骤。

104. 调查团联系了所有 19 起案件的受害者、家属和律师。除了上述三起案件外，当事人都报告说，检察或司法人员没有与他们联系提供证词，或通知他们已采取了哪些诉讼步骤或其他措施。在撰写本报告时，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尚未回应调查团提供这些案件进一步信息的请求。

105. 2014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该国报告说总共判定 379-397 名国家官员犯有侵犯人权罪。由于此类案件公开检控信息有限，特别是缺乏分类数据，对评估政府调查和起诉侵犯人权行为的努力带来了很大困难。

106. 调查团审查的公共信息表明，国家没有调查指挥系统较高级别官员的侵权责任。相反，政府报告中提到的案件只是对较低级别官员的刑事起诉。如果对高级别官员，包括调查团 2020 年报告中所指出官员提起刑事起诉，将需要按照法律要求启动取消他们豁免权的程序。⁷²

107. 除了对施害者进行调查和起诉之外，受害者及其家人有权了解侵害行为发生的真实情况。在审查的案件中，家属和律师一致表示，尽管多次提出请求，他们仍然无法有意义地查阅案卷和其他基本信息。关键的证据仍未披露，影响家人和律师提交相关材料。在撰写本报告时，受害者在了解事件真相和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方面仍然面临严重障碍。

五. 结论和建议

108. 削弱司法系统能力，无法保护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各阶层人民人权和防止在国家支持下对人民实施犯罪，这种情况在调查团接手报告任务之前已经存在，从 2014 年开始，持续到近年。政府目前在巩固和利用现有的系统。

109. 不按 1999 年《宪法》和随后法律的要求遴选和惩戒法官及检察官，特别是任命临时法官和检察官，并在正规保障程序之外解雇他们，尤其损害司法系统的独立性。

110.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在所审查的案件中，因政治人物或司法或检察机关内部的干预，法官和检察官剥夺而不是保障了实际或想象的政府反对派的一些权利。特别反恐法庭审理案件时的违规行为尤其普遍。

⁷¹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2020 年初步审查活动报告》(2020 年 12 月 14 日)，第 202-203 和 206 段。

⁷² 《宪法》第 200 条和第 266 条第(1)-(2)款。高级官员包括总统、副总统、部长、总检察长、高级军事官员、州长、国民议会议员和最高法院法官。另见《刑事诉讼法》，第 381 条。

111.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检察官和法官未能保护实际或想象的政府反对者免遭任意逮捕和拘留，他们接受非法逮捕，有时还为非法逮捕寻找法律借口，这些逮捕没有逮捕证，有时以现形犯罪为借口，而事实并非如此。

112. 法官例行公事般地下令实施审前拘留，而不是将其当作例外措施，也不提供充分或适当的理由。法官时常命令在玻利瓦尔国家情报局或军事反情报总局的设施中实施审前拘留，即使有酷刑风险，而且被拘留者在法庭上谴责酷刑或展示酷刑伤痕。

113.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检察官和法官有时在任意拘留中发挥关键作用，他们维护逮捕令、审前拘留令和基于事实的刑事指控，并支持不涉嫌犯罪或被告人未参与的证据。在某些情况下，检察官和法官基于非法获得、操纵或伪造的证据，包括通过酷刑或胁迫获得的证据来判定拘留或起诉。

114. 除了干扰尽速带见法官的权利之外，诉讼程序延误经常超出法定时限，继而的长期审前拘留或防范措施产生了有害影响，极大损害嫌疑人的生活，包括他们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

115.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司法系统行为者也应应对剥夺被拘留者的合法辩护权负责，有时不允许聘任私人辩护律师，而是坚持为被拘留者指派公设辩护人。法院官员拒绝让辩护律师接触重要法律文件。

116. 总体而言，国家没有采取切实、具体和积极的步骤来纠正侵权行为，打击有罪不罚，并通过国内调查和检控向受害者提供补救。官方信息很少，但种种迹象表明，国内对侵犯人权罪行案件很少起诉，而且仅限于最低级别官员。

117. 调查团注意到政府最近宣布的一些进展，包括 2021 年 5 月 12 日命令将军事情报局和民事情报局拘留人员转移到监狱管理部拘留中心；最高法院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通过一项精简计划，⁷³ 加快警察拘留中心被拘留者的司法程序；以及 2021 年 6 月 21 日宣布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解决诉讼拖延和监狱过度拥挤等问题。⁷⁴ 需要更多时间来评估已宣布措施的执行情况。

118.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如果检察和司法人员切实和充分地履行其宪法职责，本可以防止对实际或想象的政府反对者的许多犯罪和侵权，或者有力阻止公共安全和情报部门实施这些行为。

119. 调查团有合理理由相信，司法系统非但没有对人权遭受侵害和侵犯的人们提供保护，反而发挥重要作用协助国家镇压政府反对派。法治恶化的影响超出了当事人个人，并波及整个社会。

120. 详细调查报告向最高法院、刑事法官、检察署、军事检察官办公室、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监察专员办公室、国民议会和行政部门提出了 45 项紧急行动建议。

⁷³ 最高法院第 2021-002 号决议。

⁷⁴ Venezolana de Televisión, “Presidente Nicolás Maduro encabeza este lunes reunión del Consejo de Estado en Miraflores”, 21 August 2021.